

个体生命与 现代历史

张曙光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个体生命与 现代历史

张曙光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个体生命与现代历史/张曙光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

(学者文存)

ISBN 978 - 7 - 209 - 04214 - 7

I. 个… II. 张… III. 哲学 - 研究 - 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6362 号

责任编辑: 袁 晖

封面设计: 蔡立国 王世强

个体生命与现代历史

张曙光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32 开 (148mm × 210mm)

印 张 14.125

字 数 360 千字 插页 2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ISBN 978 - 7 - 209 - 04214 - 7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531) 87966822

目 录

引论 解思想之蔽 明生活之道	(1)
----------------------	-----

1. 生命与存在

1-1. 人的自我寻找与发现	(21)
1-2. “人”的消解与重构	(37)
1-3. 人生的“当下”意义	(48)
1-4. 生死问题与存在视域	(57)
1-5. “存在”的生存意蕴与辩证性质	(72)

2. 生存论哲学的建构

2-1. 生存问题与生存论哲学	(87)
2-2. 生存的“经验”与“超验”	(93)
2-3. 生存论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108)
2-4. 技术与技术性生存的思考	(127)
2-5.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生存哲学	(133)

3. 现代价值理论研究

3-1. “信仰”的哲学思考	(139)
3-2. “理想”的哲学思考	(153)
3-3. 道德的哲学思考	(164)
3-4. 自爱、仁爱与正义	(179)
3-5. 价值理论研究的问题与出路	(196)

4. 现代历史与历史选择论

4-1. 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	(217)
4-2. 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	(232)
4-3.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争	(242)
4-4. 从历史决定论到历史选择论	(261)
4-5. 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论	(274)

5. 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

5-1. 人文精神的哲学反思	(288)
5-2. “社会”与“文化”两种范式之争	(301)
5-3.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309)
5-4. 文化的现代化与生存视界的转换	(325)
5-5. 生存悖谬及其超越	(333)

6. 存在的“天命”与历史的“境遇”

6-1. 科学、形而上学与神学之思	(352)
6-2. 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双重维度	(363)
6-3. 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及其现代境遇	(387)
6-4. 生存与哲学的融通——访谈录	(437)
后记	(446)

引论 解思想之蔽 明生活之道

—

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人都只争朝夕，唯恐落伍。反应稍微迟钝一些，似乎就有被呼啸着前进的列车甩到地球外面之虞。人们难得静下来想一想：这是在急急忙忙地奔向何处？前面是永远变换的地平线还是确有一个“伊甸”乐园？人走下去离自己的目的地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或许这种奔忙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因而“运动就是一切”？但想不想似乎又都一样，因为人们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洪流在裹挟着自己前进。于是，哲学这一向来被认为能从根本上把捉宇宙人生的深沉的学问，也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过去，哲学雍容大度，神定气闲，乃至不可一世，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而今哲学则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浅薄浮躁，赶时髦一样地追逐时代潮流，只能“以万变来应万变”了。在这种情势下，宣告 21 世纪的哲学形态哲学范式，无论多么乐观多么动听，都不过表明哲学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时代”的回声而已。

是的，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时代不同，哲学也肯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时代的变迁是有内在根据和理路可寻的，这不是那种抽象的“本质”和线性的“规律”，而是贯彻于不同时代中的人类生存之“道”。任何时代的哲学都要把

握这个“道”，因而，不同时代的哲学又是相互贯通的。所以，黑格尔才说，一切哲学都是哲学。

笔者长期涵泳于马克思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中，近些年对西方的“存在哲学”（“生存哲学”）也做了一些研究。现在我们已经较为熟悉的“生存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已经出现了。那么，当它在西方出现时，是否意味着它是一门全新的哲学呢？是否正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呢？雅斯贝尔斯在其名为《生存哲学》的一本讲演集中却说，所谓的生存哲学，不过是唯一的古老的哲学的一种形态，它以“生存”标志其特征，不过是为了突显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观察现实，并通过人的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在西方出现的“生存哲学”不仅仍属于“唯一的古老的哲学”，而且，它还具有与当时的时代“唱反调”即批判、反抗时代的性质。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西方的生存哲学，因为它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只是囿于个体及其内在感受，虽然这是一个被近代哲学所轻忽的重要视角，但这个视角还是应当整合进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的宽广视域中来，从而获得全面性与建设性。而在哲学中实现了“革命性变革”的马克思哲学，则既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变革性继承，又是对当时德法社会主潮（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批判性审视和超越。虽然时代潮流有它的内在逻辑，但毕竟是人有意志的生命活动所造成的。人们一旦意识到时代潮流的问题并试图去改变它，即使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还是能够对它的流向有所影响，因为这种意识和举动本身已经作为时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与其他部分构成张力。由此可见，哲学不是时代的简单的回声，它也无法简单地回应时代，因为任何时代都是特定矛盾的集合，而哲学正是这种矛盾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解决。

这里表面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哲学自身的因革损益问题，一是哲学与时代的内外关系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哲学形态的变化就是它的时代性的变化。哲学的理念是一个，而任何时

代的哲学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这一理念，即使哲学童年时期的“原生”形态，虽然更接近于哲学的本性，并包含着丰富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毕竟需要展开，萌芽性的东西有待发育。而这个“展开”或“发育”的过程，并不只是借助时代的“机缘”，它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同时代中的“一以贯之”之“道”的自我开显、自我推展。“道”的自我开显、自我推展说明“道”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一的透明体，而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结构的活的生命。哲学就是时代中的那个活的生命的思想结晶和表征。只有活的生命才能生机勃勃地向前进发。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前”和相应的“后”的理解。

直观地看，向“前”在时间上是向未来，在空间上是向外部世界；但就活的生命而言，则是要走向生命自身的充分实现。生命自身就是它的活动的终极目的，生命活动的外在目标从属于这个内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向“前”就是向“后”，向“外”就是向“内”，即生命活动是自返式活动，自成目的就是返回到自身。凡为自己而存在的事物，自己必定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从自身出发又能返回到自身是自由的，因为它不仅以自己为目的，并且实现着这个目的。正是在这里，我们得以领悟人的“本性”、哲学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一个自由的人是自己活着，哲学也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所以哲学要把握的“本体”，必定是一切得以产生一切又得以复归的“母体”，因而它才具有自足性、无待性。

历史上有些学者由此认为，人及其哲学既然有此天性，就不必外求，只要在内心深处守住这个天性就行了；乃至“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曾把人的活动区分为两种，一是自成目的的活动如人的“视”与“听”，一是为了外在目的的活动如“生产”；他褒前者而贬后者，却不知前者是“目的”也是“手段”，其直接性也是社会地形成的，有中介的；后者虽然直接而言是手段，却间接地体现

着人的自成目的性。如同马克思所说，劳动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创造即人的外化和外化的扬弃。人生在世，本来与周围世界就有一种对象性关系。人的内在目的必须经由外在目标才能实现，人的自足、无待也只能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这是一个人必须经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因而是人为自己划出的生命的“圆”。黑格尔说，哲学就是思想为自己划出的“圆”。“圆”不是既定的、现成的，因而它首先不是名词、状态，而是动词、活动。在活动的初始，人与哲学是简单贫乏的，但在经历了生命机能充分发挥从而与世上各种事物打交道的对象性活动之后，人与哲学都获得了丰富的内容。黑格尔对此作过论述，我国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在讲解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以人的离家出游和衣锦还乡作过很形象的解说，叶秀山先生也有此解说。这说明人与哲学的自足、无待，都是作为一个过程间接地建构起来的。有人看到人的自我否定，即看到人的生命的外化、物化，看到人攀登登上“知识之树”，就大惊失色，仿佛看到浮士德受到魔鬼的诱惑，要人赶快抛弃一切“身外之物”，固守着自身的“生命之树”，一生一世也不要离“家”，果真如此，那人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所谓的“圆满”，相反，人的生命机能只能因为得不到发育和施展而呈干瘪状。

然而，现时代的确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社会像着了魔似地高速运转，变化万端，而人们你追我赶，疲于奔命。人们的行为完全是社会“结构”造成的吗？然而社会结构不过是人们的相互关系。虽然人们的相互关系维系于他们与自然对象的关系，不能化约为他们的主观意志，但是，人们对自身的活动及其结果毕竟可以预见并进行调控。事实上，社会的发展变化都维系于人的自成目的的生命活动及其偏好。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物的世界”的增长扩张，正是人们对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要求和物质财富越来越大的欲望使然。首先是人们普遍地把功利、效率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而社会形成了围绕获取功利、提高

效率而“竞争”的机制，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就把人拖入到相互“博弈”的旋涡之中，使人“不得不”与人夺利争名。本来是主动地活动的人，变得越来越被动、无奈、身不由己，只是感到“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行妨”，到头来不知究竟是因为什么奔忙，再也找不到归“家”之路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的自性的迷失。看来，人的初衷是要求得生命的圆满即为自己划“圆”，但划出来的却可能是一条不归路。现实中的人的确可以走向“恶的无限”，在滚滚红尘中一味外骛，无从自返；浮躁浇薄，自性迷失，导致庄子所说的“吾丧吾”。这是人根本上的“异化”。

思想的“圆”是靠思想的否定之否定来建构的，思想的否定之否定基于思想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即“反思”。但只知跟在时代潮流后面跑的“哲学”，简直说不上还有“思想”，它不是用“哲学的语言”重复主流话语，就是赶着社会上的新鲜事发议论，其实由于说的多半是大话和废话，所以也不过是凑热闹。而它表达的真理则多半属于人们的“良好”愿望，既不是对现实的矛盾的直面，也不是对各种观念的反省和批判。这样的“哲学”，怎么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呢？它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自足、无待和圆满了。

人及其哲学是否就这样一直迷失下去？生活本身会教育人。既然人生中有以一贯之之“道”，这个“道”就总要或从正面或从反面来显示它的威力。

时下，社会中愈演愈烈的种种悖反现象大概就是“道”的警示：当代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固然有增无已，甚至走向庸俗和恶俗，但与此相反的“神圣化”的潮流也在不断高涨，各种宗教（乃至邪教）迅速复兴与崛起就是明证。与跟着“感觉”走背道而驰的是跟着“信仰”走；与科技至上唱对台戏的是人文至上；与激进主义相伴随的是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相颉颃的有原教旨主义；与相对主义唱反调的有绝对主义；与一味“务

实”相对立的是凌空蹈虚；在一片“进步”、“发展”的喧哗和烦恼中，在人的内心深处涌动着的是浓浓的乡愁，是“还乡”、“寻根”的取向……总之，我们从任何一个走向极端的片面化现象之外，都能发现另一个片面化现象与之抗衡并试图消解对方。这种两极对立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说明人性已经发生了严重倾斜、严重的单面化？而内在地具有全面需要的灵肉一体、群己相关的人，本然地祈向生命的圆满，他不可能长久地容忍生命的残缺。所以当人生发生严重的倾斜和单面化时，才会通过两极对立的背反现象使人们自相反对、自我惩罚。人们可以不承认“历史辩证法”（虽然今天许多人不喜欢这个名词），但历史辩证法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辩证法却总要在人自己身上起作用。

人性的严重倾斜、严重的单面化，不仅缘自于人对“物”的贪婪的“占有”取向，还是与前述“自由”不同的另一“自由”观念推波助澜的结果。人性的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的自由的“无度”，“无度”是无尺度、无界限。“自由”意味着打破外在的限定，在这个意义上，外在的尺度和界限并不能从根本上强制它，但它本身却有尺度和界限。莱布尼茨讲“上帝之内的和谐”，我们认为人要自立法度、自我规约，在自我否定中做到自身认同。何谓人的“自身”？它既是指灵肉一体群己相关的个体，同时又指所有这些个体共同营建的生活家园。如果说人是他的生活家园的人格形式，那么生活家园就是人的非人格形式。人认同自身、回到自身，就是使整个身心及其生活家园获得充实、丰富、完善。当代的问题恰恰在于自由被理解为任性的“为所欲为”即感官和欲望的随意放纵与渲泄，但放纵渲泄之后，剩下的却是空虚和无聊。靠物的占有也决不可能填满人的空虚和无聊。所以我们才说人迷失了自性。

针对过去认为人是一个给定的“实体”，现今人们强调人永远在变化之中而不可能最终完成；人怎样活动他就是怎样的人。这是人的一大觉悟。但是，我们作为人并不甘心于“走到哪儿

就算哪儿”。人对自己总有一个合乎“人性”的基本要求。“人性”是可塑的，却不能无序地漫无边际地变化。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固然首先是否定性的，是原始状态的和谐与圆满的打破，人与自然、与他人、人与自身都分化开来且彼此竞争。但否定中有肯定，分化中有整合，竞争中有合作。从终极意义上说，人的活动指向人性和人的世界的新的和谐与圆满，这也就是合乎人的生存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实现及其良性互动，这也是自由的真谛和归宿。

今天，笔者认为作为“自由的学问”并致力于“寻求人生意义”的哲学，其当务之急是重思“自由”的本性及其与人生“意义”的关系，让人的活动更加合乎情理。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不在于他的生命的外化、物化，也不在于对生态平衡的打破和原来意义世界的坍塌，而在于他能否成功地扬弃这种外化、物化，能否重建新的生态平衡和意义世界。老子曰：“根深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也。”人的“长生久视”在于“根深固蒂”；人的“根”和“蒂”其实就是自己的生命，而要扎得深，培得固，就要全幅展开自己的生命，全方位地通达上下四方，古往今来，吸纳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反转来丰富、完善自己的生命，使之“充实而有光辉”（孟子语）。

二

哲学是什么？将这个似乎简单的问题质之于当代的哲学家，也甭想指望获得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答案。我们所处的语境中早就有一堆关于哲学本性的现成的语词：形上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世界观、方法论、人学等等。然而，这些杂多的语词所要表明的似乎不是哲学的共通性而恰恰是哲学没有共通性。经过二千多年的发育成长，哲学早就由一簇幼芽长成参天大树，它的枝枝叶叶不仅千差万殊，而且有了固定的样式，若靠概括其外延而求其内涵，那么人们所能得到的也无非是上面那些语词。而即

使理解了这些语词，人们对哲学这棵大树的现今的面目也仍然会感到模糊不清。或许，要揭示哲学这棵大树的本来面目或应有面目，真正可行的不是把目光停留在那繁密芜杂的枝叶上，而是循着枝叶的来路、透过枝叶的遮掩进入到树干和树根。一旦这样做了，我们会发现，哲学原来不过是一粒质朴纯净、浑然天成的思想种子。就此而言，思想才是哲学最根本的共通性，哲学的本性，而哲学就是思想之学。

思想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是思想之学这句话，似乎是一句还不如前面那些语词更为切题的泛泛之言。其实不然。前述语词指称的是哲学在历史上不同的形态，思想一词则表征着哲学的内在目的，哲学在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追求。哲学之所以要变化其表现形态，正是为了捕捉到思想之进展、把握住思想之整体。

当然，思想并非哲学的专利，各种理论学科都是思想的产物并都有自己的专业思想。但是，哲学之外的各种理论学科都不把自己的专业思想作为对象而只是奉为向导，各种专业思想亦非思想之原型而只是思想之变体，非思想之共相而只是思想之具相。哲学则不然。哲学要研究思想本身即把思想作为一个总体予以思考和把握。而哲学之所以能够也必定以思想为研究对象，则在于惟有它充分地表现了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不管这是否可能。而在人的思想试图穷尽对象世界时，它却发现自身并非超然世外、洞察一切的神目，而是与对象世界处于相互缠绕之中的生命意识、生活意识。生命混然天成，懵懵懂懂，而感官象一扇扇打开了的窗户，使外在太阳的光芒照射到生命的深处，于是生命从自身中生出意识的光、精神的光，来辉映那太阳的光。这也就是人的生命的自觉。生命因自觉而有别于物，但它永远摆脱不了物性；生命因自觉而有了神性，但它也永远成不了神。这就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的矛盾，也是人的生活的基本性状。人的所思所想都是由这个矛盾并围绕这个矛盾展开的。那原初的同时也是终

极的思想，就是直接意识并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思想，因而是自在自为的、思与反思相统一的思想。我们把这种思想的理论表现称之为“哲学”，于是，哲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思想之学。

中国与西方哲人的思考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读老庄的书，我们多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感觉，让人在直觉的透视中体会到思想的力量和人的命运。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当人运思并试图把握“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时，思想却进入有与无、具象与抽象、能指与所指的矛盾之中；而这个矛盾又逼迫思想不断地向前进取，不断地留下思想的痕迹。但是“向前”也是“向后”，“进取”亦是“返回”，思想只能进行圆圈式或循环式的矛盾运动，因为这正是那“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通过人的思想所做的游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庄子亦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无乎！无适焉，因是已。”既然万物与我一体，我还能言说吗？既然已经说了万物与我为一，还能说没有言说吗？巧历也算不出最终的数目，何况普通人呢？不必再往前算了，因任自然就是了。

再来看西方。如所周知，泰勒斯的“万物起源于水”意味着哲学在西方的萌生。泰勒斯的这一断言所体现的，是终于摆脱了原始“互渗”状态的思想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作的昭示。这一昭示是如此之素朴天真、大胆豪迈，它以为直截了当地就可以把世界的本来面目予以敞开。于是，它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凭借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来推测世界之起源与始基的热情，各种“本原”说相继问世。然而，关于万物起源的直接断言还只是萌

动着内在生命与张力的思想原种，它们并未自觉其为思想。而诸多本原说在互相争执中暴露出来的多与一、变与不变、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却使巴门尼德意识到思想及其反思功能在清理各种“意见”中的极端重要性。巴门尼德提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使思想与存在一体性地成为哲学的对象与内容，由此，哲学作为思想之学正式形成，思想则通过哲学自觉地踏上了思与反思的征程。

哲学既然是思想之学，为什么多年来不仅受到大众的冷遇而且受到各种学科的冷遇？是社会以及学界对思想不再有强烈的需求因而相应失去浓厚的兴趣，还是原来哲学形态所包含的思想已经实现而现今的哲学难以催生出新的思想？笔者以为，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有，而更重要的是后一原因。

思考一下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建构宏伟的哲学体系和消除任何哲学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完全相反的两个努力方向。而这两代哲学又都是在维护“思想”的名义下展开自己的活动的。这就很值得我们品味一番个中奥妙。

西方近代哲学肇始于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随着培根对包括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内的各种假相的痛斥和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一天赋观念中最重要观念的提出，思想在近代西方真正奠定了它的权威地位。其后，尽管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各执一端、往复驳难，但就其揭示思想认识的感性来源和理性形式的矛盾从而推动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其孕育和发展科学技术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功绩而言，两者简直可谓“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后来，当陷入莱布尼茨独断论中的康德被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他看到了理性自身的局限。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界既防止了它们互相僭越又使其各自的道路得以畅通，人的生活世界中的真善美诸种价值由此成为不同类型的思想所追求的对象，人

作为思想存在物的主体性、目的性也相应得到突出和宏扬。这样，尽管思想与存在在康德那里还是分裂的，但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却开始了以人的精神主体性为轴心的统一。这种统一在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中似乎得到了最终完成：思想达到了它的全部普遍性，作为思想直接性的存在则获得了它的全部丰富性；“绝对”的理念经过哲学思想的长途跋涉终于被发现，而绝对的理念正是返回到自己本身的思想。

就黑格尔哲学的真实革命意义而言，本来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历史性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这个哲学从理念出发泛逻辑地推演出的似乎是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却俨然使自己成为洞察一切的“神目”（GOD VISION）。而事实上，人的思想永远不能达到上帝才能达到的全知全能，因为它必须以人的具体的生命活动为依托并受其制约。人类思想通过黑格尔哲学所作的企图把握绝对而终极的真理的这场试验，不能不以失败告终。

以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为标志，近代西方哲学开始了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原来以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等形式存在的知识性理论，如今纷纷甩掉哲学的外壳成为独立的实证科学；哲学不再研究具体领域的问题，哲学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净化。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言，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为了彻底清除冒充“思想”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在英美经验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分析哲学进而推动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表明语言的分析批判成为哲学关注的主要事情，而关注语言正是为了澄清思想，因为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和存在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